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现当代地域文学研究丛书

朱晓进 丁帆 主编



东北文化与东北文艺

孟繁华◎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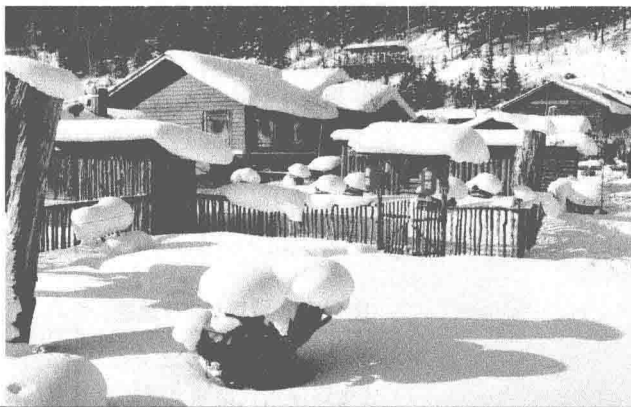


科学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现当代地域文学研究丛书

朱晓进 丁帆 主编



东北文化与东北文艺

孟繁华◎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在东北地域文化视域下，对 20 世纪以来的东北文艺的整体审视。其中既有文化历史的总结，又有文化特点的聚焦；既有文学脉络的梳理，又有具体文本的解读；既有对积极文化因素的弘扬，又有对消极文化因素的批判；既有纯文学的视域，又有民间的视野。应该说，全书从整体上较为系统地呈现了东北文化的历史时代特点，及其影响下的各类文艺创作和文艺发展的主要格局与基本面貌。

本书适合地域文化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高校师生、文学爱好者等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北文化与东北文艺 / 孟繁华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3

(中国现当代地域文学研究丛书/朱晓进, 丁帆主编)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ISBN 978-7-03-060783-6

I. ①东… II. ①孟… III. ①地方文化-关系-文学研究-东北地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4025 号

责任编辑: 王 丹 / 责任校对: 贾娜娜

责任印制: 徐晓晨 / 封面设计: 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1 1/4

字数: 350 000

定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北地域文化研究”
(10ZD&071)的阶段性成果

目 录

绪论 东北地域文化的建构与想象	1
第一章 东北文化的变迁与建构	6
第一节 “东北”与东北文化的含义	6
第二节 东北文化的多义性	8
第三节 东北文化的精神特征	16
第四节 东北文化与东北的文人和艺人	18
第二章 现代中国的“文学东北”	24
第一节 “东北作家群”与战时“流浪”	24
第二节 萧红的“冷漠荒寒”	27
第三节 萧军小说中的“家国”	36
第四节 端木蕻良的“精神还乡”	44
第五节 骆宾基小说的东北民风民俗	52
第三章 红色文化与东北文学	63
第一节 概述	63
第二节 《暴风骤雨》与东北方言俚语	68
第三节 《林海雪原》的英雄与“土匪”	77
第四节 草明小说与东北工业文明	91
第四章 东北文化与“知青文学”	100
第一节 北大荒与“北大荒兵团文学”	100
第二节 本土知青梁晓声的小说	110
第三节 东北的“他者”与张抗抗的小说	119
第四节 陈可雄与陆星儿的小说	127
第五章 新世纪的“东北作家群”	136
第一节 迟子建的“神性”世界	136

第二节	阿成的哈尔滨叙述	146
第三节	白天光的“关东奇绝”	158
第四节	谢友鄞的“边地”故事	169
第五节	孙惠芬的“歇马山庄”	177
第六章	影视中的东北	191
第一节	“长影”简史	191
第二节	张笑天的“雁鸣湖”	200
第三节	韩志君与“命运三部曲”	208
第四节	高满堂的《闯关东》	216
第七章	东北戏剧	229
第一节	关东戏剧的崛起	229
第二节	东北话剧与京味、海派话剧比较	239
第三节	“老树”与“土地”	254
第四节	何庆魁、崔凯的小品	261
第五节	赵本山、高秀敏、范伟的小品表演	268
第八章	东北二人转	279
第一节	二人转的缘起	279
第二节	二人转的历史变迁	284
第三节	“刘老根大舞台”	289
第四节	二人转与文化产业化	294
第九章	东北文化批判	300
第一节	东北文化的劣根性	300
第二节	娱乐文化的过度消费	307
第三节	“赵本山现象”批判	314
第四节	重建东北文化	324
参考文献		332
后记		334

绪论 东北地域文化的建构与想象

东北，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指出东北的存在，首先，意味着有一个指认方位的“中心”的存在，这个中心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当然是中原；其次，东北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从历史上看，东北地区除原住族群外，主要由三种人构成：一是流民，二是谪戍，三是移民。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角度看，东北大致与蛮荒、落后有关。这一时空状况导致了东北历史上文化的驳杂性和文风孱弱的事实，因此也难以形成特色鲜明的文学传统。古代东北除了以吴兆骞为代表的“流人文学”和纳兰性德的诗词外，鲜有流传或被普遍关注的作家及作品。

东北文学真正产生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影响的，是现代文学史“东北作家群”的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等作家的出现。他们的创作，深刻反映了日寇入侵后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强烈表达了对家乡的怀念和光复国土的愿望。在对东北风情生动的描摹中，显示了鲜明的地缘文学特征。他们刚健粗犷的风格和浓郁的乡愁，开启了东北现代文学的新传统，是东北文学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立波、曲波、草明、郭小川等，先后以东北生活为原型写出的《暴风骤雨》《林海雪原》《乘风破浪》《林区三唱》等作品也名重一时。但是，东北文学再次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是新时期初期的“知青文学”。特别是“北大荒知青作家群”，如张抗抗、梁晓声、陆星儿、张辛欣、萧复兴、贾宏图、徐小斌、邹静之、陈可雄、李龙云、何志云、李晶、李盈等，构成了“知青文学”的主力阵容。许多人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作家并一直保持旺盛的文学创造力，同时也是批评界和研究界持续研究的重要对象。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周立波、曲波、草明，还是“知青作家”，他们的创作虽然也具有东北文化博大雄浑、壮阔宏伟的风格或气质，但是他们的原乡文化也无意地融入了他们的创作中。不同的文化资源和记忆使东北文学具有了鲜明的文化融合性。因此，在强调东北文化特殊性的同时，“新流人文化”对东北文化建构的价值和意义同样重要。

新时期以来，东北本土作家的创作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张笑天、梁晓声、金河、刘兆林、邓刚、达理、谢友鄞、朱春雨、金景河、胡小胡、于德才等的小说；胡昭、曲有源、李松涛、胡世宗等的诗歌；程树臻、贾宏图、乔迈、中夙等的报告文学，多次获全国大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马原、洪峰、徐坤等先锋作家的创作。马原、洪峰与其他先锋文学作家开启了中国“先锋文学”的先河，他们改写了中国文学一体化的局面，《冈底斯的诱惑》《瀚海》等小说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徐坤继承了“先锋文学”的遗产，她的《白话》《先锋》《厨房》等，在“后先锋”时代占有重要位置。

进入新世纪以来，东北文学焕发了新的生机。迟子建是东北唯一获过“茅盾文学奖”和三次获过“鲁迅文学奖”的作家，因此，她是新世纪东北的核心作家之一。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对鄂温克人历史与现状的书写，不仅将一个富有诗意的民族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她将一个民族的心灵史讲述得声情并茂、绵长悠远。她的中、短篇小说同样取得了重要成就：《雾月牛栏》《清水洗尘》《白银那》《日落碗窑》《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起舞》等，构成了其璀璨的小说世界。跌宕的故事和多种文化的交融，将迟子建的小说装扮成北国的俏丽佳人。久负盛名的阿成，一直保持旺盛创作力，他的创作成就主要集中在短篇小说《年关六赋》《良娼》《胡天胡地风骚》《东北吉卜赛》以及“简史”系列等，多以哈尔滨生活为背景、以底层市民为主要书写对象，在或悲怆或温婉的讲述中，呈现出了一个既雍容俏丽又悲苦荒寒的哈尔滨。

张笑天是东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家。出版有30卷《张笑天文集》，计1800万字，从创作数量上说，当代作家几乎无人能敌。长篇小说《太平天国》《永宁碑》等深受好评；中篇小说《公开的“内参”》《离离原上草》等有广泛影响。特别是电影剧本创作，使她成为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电影剧作家之一。朱春雨的中篇小说《沙海的绿荫》和长篇小说《亚细亚瀑布》，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小说。著名诗人曲有源的诗歌创作，无论是诗歌观念还是形式，都是新时期探索中国诗歌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关于入党动机》传诵一时，并获全国1979—1980年新诗优秀奖。新世纪以来，金仁顺、朱日亮、刘庆、夏鲁平、王怀宇等的小说；胡冬林、格致等的散文；薛卫民、张洪波、于耀江等的诗歌，极大地丰富了吉林的文学版图。金仁顺的《春香》、朱日亮的《走夜的

女人》、刘庆的《长势喜人》等，使他们进入了新世纪文学的第一方队。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吉林的两大文学刊物——《作家》和《文艺争鸣》，它们赫然名列国内名刊已久，在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获奖率和转载率均居国内前列，备受瞩目。

辽宁是中国文学创作的重镇，它以“团队”的力量在全国产生影响。近年来，孙春平的《怕羞的木头》等中篇小说、孙惠芬的《上塘书》《生死十日谈》、谢友鄞的《一车东北人》、刁斗的《代号：SBS》、马晓丽的《云端》、皮皮的《爱情句号》、津子围的《童年书》、陈昌平的《斜塔》、李铁以工厂为背景的中篇小说等，是批评界近年来重要的批评对象和谈论话题。辽宁当下的小说创作虽然还没有出现在全国具有“领袖”或象征意义的作家，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文学的“造山运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小说的高原地带。

值得强调的是，辽宁是一个散文创作的高地，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其作家队伍和声势，而在于它不能替代的影响力。王充闾的文化散文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可以看作是这个时代散文创作的标志性成就，他在文坛引起的巨大反响仍在持续。他的近作《张学良人格图谱》，力图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从而展现出张学良的人性和人格。张学良的义气、重情谊、一诺千金、敢作敢为、有英雄气也有草莽气等气质，在王充闾的叙述中跃然纸上。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对人与自然、家乡、历史的感受新奇而生动，鲜明的个性难以取代。青年散文家张宏杰的“大历史散文”打破了散文写作的“范式”，他的历史学修养和对散文新的理解，为这一文体带来了新气象。素素的散文对东北的人与事、风情与风貌、日常生活的书写，充满了温暖的情与爱。在诗歌领域，李松涛的《黄之河》、林雪的《大地葵花》等，或大气磅礴，或中西融会而独树一帜。

东北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多样的风格和文体完备的“北国风光”。更重要的是，在逐渐形成东北文学地缘特色的同时，东北作家作为中国文学积极、健康的力量在全国产生了越来越深远和广泛的影响。作为一个现代工业发达的地区，东北不仅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时也有中原文化、工业文化、红色文化等多种文化资源。但是，独特的现实环境和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也给东北作家的创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应该承认，东北文学的特征还在构建过程中，它与北京、上海、陕西、山西、河南、江苏、浙江、山东等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地区大不相同。这些地区的地缘文化或文学特征及其承传是有

系谱的，它们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多彩、特色鲜明。这一文化优势，东北没有或者非常稀缺，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东北的文学家将会实现他们建设中的大东北文学的宏伟梦想。东北地方性或边缘性的文学经验，也一定会为中国文学实践提供新的经验和认知可能。

东北也是国内大众文化或娱乐文化的重要产区。电影、电视剧、小品等创作、生产的发达程度，在国内占据领先地位。但同时，某些娱乐形式的问题也相对突出，如小品。纵观小品发展的历程会发现，它是沿着一条越来越庸俗化、越来越迎合低级趣味的方向发展，小品的“创作”不仅已经捉襟见肘，而且显露了勉为其难的危机。“小品”是当下娱乐文化的宠儿，从课堂教学的一种形式演化为一种大众娱乐的文艺形式，大概只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还没有哪种文艺形式像小品这样“长盛不衰”。没有小品的晚会是不受欢迎的，不仅一般的娱乐场所要演出小品，而且权威传媒的晚会也将小品列为重要的内容，以达到“掀起晚会的高潮”的效果。小品使传统的相声相形见绌、走向末路，一些相声演员已经改弦易辙去演小品。于是，在演艺界或普通观众那里，小品演员的“知名度”几乎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小品演员成了大众文化的一种表征，成了这个时代真正的“文化英雄”，但是，小品的危机也如期而至。

小品的危机，说到底是一种“农民文化”的危机。二十多年的小品舞台上，呈现出来的内容和题材，基本上是愚昧、滑稽的“农民文化奇观”。在全球化和现代文明的语境中，被构建的农民文化越来越具有“奇观性”，在展示这一“奇观”的过程中，对农民文化的“妖魔化”，是当下小品主要的表达策略。我们应该承认，大众文化的市场化，适应了这个时代的消费要求，也使20世纪以来“一体化”的文化生产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大众文化毕竟是消费性的文化，对大众文化不能用精英或经典的批评尺度去要求。作为批评家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在面对大众文艺进行理性批评判断时，其文化目标诉求的差异，很可能导致批评错位而成为无效的批评。从本质上说，包括小品在内的大众文化是消费性的，它的功能是娱乐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受到普遍欢迎的形式里，我们应该对“娱乐边界”有所警觉，应该对未来精神家园的重建有所忧患。

对于转型时代的中国大众文化的阐释显然要面对各种复杂、困难的问题。它的复杂程度使任何一种判断都失之武断。我们也常常见到有的人对自己文化

传统悠长久远的盲目自豪，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上，他们既不知道传统文化是什么也不知道在哪里。中国的传统文化太复杂，既有民间的也有庙堂的，既有健康的也有陈腐的，既有中断的也有延续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小品“欢笑说”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民粹主义作出必要的检讨和反思。一方面，如果说小品是为了让人民高兴，那么，人民不仅需要除夕夜高兴，他们希望每天都能过上高兴的日子。另一方面，当广泛的民众动员的时代过去之后，与“大众”相关的一些概念也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含义。他们被赋予的革命性、先进性不仅逐渐地褪去，甚至还会受到深刻的质疑。特别是进入市场和商业化时代之后，“大众”对文化的要求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的上述疑虑。在商业化的时代，“大众”就是一个消费的群体，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才有今日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及其市场的出现。但这时的“大众”仍不是一个整体，他们善变的、不同的趣味会决定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小品文化充满矛盾和悖论：一方面是丰盛的小品文化，另一方面是坚持“文化是一种力量、文化是一种影响、文化是一种情怀、文化是一种温暖”的文化立场。这里不仅仅是欣赏趣味的雅俗关系问题，而是我们正在重建的精神生活和公共文化向哪个方向发展的的问题。因此，事关重大。我希望表达我们精神生活的文化在求新求变的同时，要静下心来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这些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的，从1993年前后开展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一直到今天，问题从来没有终止过。因此，在“想象和建构东北文化”的同时，我们更有必要面对当下的东北文化。

要梳理、弘扬正面的东北文化，也要批判不断被放大的、被“妖魔化”的东北文化。

孟繁华

2018年12月

第一章 东北文化的变迁与建构

第一节 “东北”与东北文化的含义

一、“东北”与“关东”的命名

在一般的知识理解和习惯表述上，人们往往把“东北”与“关东”混为一谈。其实，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地理上来说，二者都是有差别的。“关东”一词明显早于“东北”，而且二者在地理上所指并非完全相同。“关东”最早是指函谷关以东之地，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称，“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①。“关东”实质上是指函谷关和潼关以东地域，所以相对于关东之地，又有“关西”之称。“关东”概指东北地域应该是在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徐达修建山海关之后，即指山海关以东之地，不仅包括今天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还包括原来的热河、察哈尔（现在的河北省北部和内蒙古东部）等地。明朝人赵震元《为袁氏祭袁石寓宪副》中便有“关东之军”之说，清人郑燮《潍县竹枝词》中亦有“关东逃户几人归，携得妻儿认旧扉”^②之句。

“东北”一词最早作为历史地理概念，毫无疑问应该包括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前清朝在东北区域的全部领土。这可能才是真正的“东北”的概念，当然，这个概念已经成为纯粹的历史地理概念而留在中国人悲哀的记忆中了。现在所说的“东北”一词，是指今天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所以俗称“东三省”。虽说有人仍然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三盟列于其中，但是，这个划分方式随着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行政区域的重新调整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

^①（西汉）司马迁：《史记》，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427页。

^②潘超、丘良任、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北京出版社，2007年，423页。

忽略。从历史上的行政区域设置来看，虽说自周时开始，先后有“幽州”“燕”“辽东”等行政区设，但是明确以“东北”之称设辖最早始于辽朝的军政建制。辽朝以各族首领统辖其族军政的方式，设立了“东北路”，分为“东北路招讨司”“东北路统军司”“东北路女直兵马司”，金朝沿用辽制，仍以“东北路”为名设立官职和机构。至此，“东北”不仅成为一种明确的地理概念，而且成为明确的行政区域概念。

所以说，无论是从形成的历史时间的先后来说，还是从地理方位表述的准确性来说，使用“东北”一词要比使用“关东”一词都更为适宜。因此，我们在本书中统一使用“东北文化”而不使用“关东文化”。

二、东北文化的含义

如果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说，近代以来我国东北地区是行政区划变动最频繁、复杂的地区，但是同时与其他区域相比，“东北”“东北文化”“东北人”作为一种地域概念、文化概念和身份概念成为被集中标识和指认的概念。而东北人自身也普遍认同这种指认。

东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系统中以不同地理区域为界限的地方文化类型。即在一定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或者行政区划内，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的具有某些共同文化要素特征的文化类型。这些类型化的地域文化影响着该地域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活动。因此，地域文化的本质就是人们适应其地域历史传承和风俗习惯的一种“活法”。

中华文化是由若干个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构成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体现，挖掘和研究各地域文化的深刻内涵和优秀成分，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内在构成的探讨。中国地域文化中特色比较鲜明的有齐鲁文化、中州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徽州文化、东北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等。东北地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特殊地域文化类型，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东北地域文化既是文化空间概念，同时更是历史延续的时间概念，是不同空间区域的多种历史文化的积累，是一种时空统一的文化复合体。以行政区划作为确定东北地域文化范围的标准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东北地域文化的确认是以文化地域的相对独立为依据的，行政区域划多是人为设置的，并且在历史

上多有变化，与文化地域并非完全一致，因而不能作为划分地域文化的标准和规则。这种划分方式虽说注意了东北三省地域文化横向的比较关系，展现出东北地域文化的内部差异性，但是在整体上割裂了东北地域文化的一体性和统一性。“东北”和“东北人”一般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被认同的，这种认同比其他地域的认同都更加明显和普遍。文化性格与语言的一致性是一种认同的重要原因，行政区域的省份被淡化和忽略。

东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根基，最为重要的是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远古东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流之一，与中原文化等一起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至明清时期，东北文化的发展主要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中原文化的辐射形态。近代以来，东北文化又受到异域或外来文化及当代体制文化的影响。在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变迁中，东北文化融会了汉族和北方多个少数民族的文明智慧与外来影响，逐渐形成了与中原文化多元一体且具有明显文化特质的地域文化系统。东北地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华主体文化的一种表征形态，与其他地域文化共同为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基础，成为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文化资源。

第二节 东北文化的多义性^①

一、东北文化的多义性是东北多民族格局的确立、东北历史的复杂变迁紧密相关的

夏商时期，“东夷”各族活动在东北地区，主要包括孤竹、令支、徙何、俞人、周头、青丘等民族；后来山戎、东胡、秽、貊、北发、白民、高夷、古肃慎、真番等民族也相继产生。随着民族的分化、组合，到了西汉时期，东北民族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夫余、高句丽、沃沮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增加了挹娄、契丹、库莫奚、豆莫娄、地豆于、乌洛侯、室韦、勿吉、靺鞨等民族。两宋至元，女真、蒙古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强大。明朝时期，蒙古与女真分割了东北地区。到了清朝，在明朝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达斡尔、鄂伦春、鄂温

^① 本节为作者张福贵与吉林大学文学院赵英兰教授合作完成。

克(索伦)、赫哲等少数民族,同时,在清政府禁放人口政策的影响下,中原汉族人民也移流至该地区。至此,东北多民族格局最终确立。从远古时代直至明清时期,东北地区逐渐形成了汉、满洲、蒙古、朝鲜族、鄂温克、鄂伦春、赫哲、达斡尔、锡伯、回族等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格局。

二、从生活生产方式来看,东北文化具有多种民族文化形态

(一) 汉满民族与农耕文化

汉满农耕文化主要集中于东北中部平原地带,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大部分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的广大区域。“这一民族文化形态是在关内、关外人口迁徙流动,关内汉人移民文化与东北满人为主体的土著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同化与变异的过程中形成的。应该说,其文化融合的价值取向是满洲向汉靠拢的。汉满民族从地域融合、婚姻血缘融合,到生产与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民俗民风、宗教信仰等方面融合,至清末而形成了东北的农耕文化。”^①

(二) 蒙古与草原游牧文化

宋朝以来,蒙古逐渐活跃在东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及今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西部的边缘草原地带,并在该地区繁衍生息,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草原游牧文化。这一民族基本保持传统的生产生活习俗——“壮牧畜为生,逐水草四散居住”^②,而到了近代,出现了弃牧归农的现象,虽然在生活方式上吸取了相当多的汉满农耕文化成分,但并没有出现像汉满文化那样充分的融合态势。

(三) “少数土著民族”与北方渔猎文化

东北的土著民族除满洲外,主要有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相对于满洲、蒙古等“多数土著民族”,我们称之为“少数土著民族”。他们主要生活在汉满农耕文化区和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区之间,沿嫩江、大兴安岭由南向北延伸,在大兴安岭最北端折向东南,沿黑龙江、小兴安岭一直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汇合处。这样的生活境遇,使其形成了北方风格的渔猎文

① 赵英兰:《生态环境视域下清代东北地区人口状况解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② 张忠海主编:《洮南市志(1902-1987)》,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71页。

化。他们以狩猎、捕鱼为生，不种五谷，以鱼皮、兽皮为衣，信仰原生形态的萨满教，实行风葬，流传有民族特色的民歌。应该指出的是，随着自然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变化，渔猎文化迅速消逝，已经逐渐成为非生需要的一种地域文化仪式。

（四）朝鲜族与北方稻作文化

中国的朝鲜族最初于清朝中晚期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移居吉林省东部等地区，并带来了适于东北寒冷地区种植的“水稻之法”。他们在这里“开畦、引水、试种，获利颇巨”^①，水稻的品质上乘，“粒白质腴”，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北方稻作文化。20世纪初期，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大量增加，在与东北其他民族既有冲突又有融合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为东北地域文化增添了独特的风采。朝鲜族作为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繁荣的音乐和歌舞文化对于汉族影响很大，而且其饮食文化也多被其他民族所接受。

三、从历史变迁、族群主体和社会属性来看，东北文化具有多种社会形态

（一）宗教文化

东北民族的构成特点就在于多种少数民族共同存在的格局。这种民族构成特点一方面使东北文化呈现出整体相近而风格多样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也使东北的宗教文化呈现出繁复多元的状态，因为东北各少数民族都具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和精神图腾。但是，随着民族历史的演变和政权的统一，萨满教逐渐成为东北各民族普遍的宗教信仰。从乌桓、鲜卑、夫余、高句丽、勿吉、女真到满洲、达斡尔、鄂伦春、赫哲等北方少数民族都信奉萨满教，直到当下，东北民族中仍旧保存着萨满教的故事传说和相关服饰、器物、神谕、宗谱等宗教实物。可以说，萨满文化不仅是特定群体的精神核心，也是一种社会化、全民化的意识形态，并成为东北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萨满文化对建构东北文化精神实质和价值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转引自杨英杰：《清代满族风俗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260页。

萨满文化所提倡的群体精神、英雄崇拜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奔放的生命力、坚忍不拔的性格等，都成为东北文化的精神源流之一，并对东北各民族精神、心理素质和个性品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萨满文化渗透到了东北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东北各民族生活的精神基础和人生观念基础。例如，东北各民族普遍对神灵的崇拜和敬畏，对家族祖先的膜拜，以及婚丧嫁娶、祈福祝寿等民俗都与萨满文化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且萨满文化对东北的文学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东北民族的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艺术形式都带有萨满文化的痕迹；更为重要的是萨满文化对东北人的伦理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关内汉人的迁移与“亚中原文化”的形成

清朝中晚期开始，随着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区大量汉人移民移入东北，关内传统的中原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对于东北文化的影响也进一步强化。与东北地区以往所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有所不同，近代“闯关东”移民所带来的中原文化更多的是以民间性的文化传统为主，而过去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和“流人”群体所传播的则以官制的中原文化为主。因为“闯关东”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在关内生存不下去的下层农民，但凡过得下去，安土重迁的民众是不会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而背井离乡“闯关东”的。所以“闯关东”移民中没有官宦之家也少有书香门第，都是活不下去的最底层的农民。他们所携带的中原文化多是以民俗民风为主要表征的民间性的中原文化，与正统的、官方的传统文化有所不同，是一种“亚中原文化”。这也为东北文化带来更鲜明的家族观念和“行帮气”。

这种民间性的中原文化为近代东北地域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从民间底层扩大和巩固了中原文化对于东北地区的影响，到了明清以后，中原文化已经完全成为东北地域文化的主体。东北文化就是在中原文化多重影响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而逐渐形成，并有次序传承下来的。

古代东北文化除了接受汉文化本体，并且日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以外，体现东北游牧民族或者半游牧民族独特东北文化也日渐孕育和沉淀，这尤其体现在东北自身的语言、民俗和宗教信仰之中。